

综述

苏联传媒研究状况综述

李淑华

【中图分类号】K512.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1094(2016)06-0090-0005

一、关于传媒概念的释义

从普遍意义上来看,传媒是指“大众传播媒介”,亦称“传播媒介”、“媒体”,就是传播各种信息的媒体,是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网络、电影等的合称。《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并未对“传媒”或“媒体”给出明确的定义。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对“传媒”的释义为:“传媒”即指“传播媒介”,其有两层含义,其一为“传播病原体的媒介”,其二为“传媒”、“媒体”,承载、传递信息的载体,通常指“大众传媒”;广义还包括说话、写作、姿势、表情、服饰、表演、舞蹈等。本文所涉猎的“传媒”并非广义上的传媒,而是取其第二层含义。

俄文传媒一词有多种表示方法,其中 *медиа* 一词源于拉丁语 *Medius*, 音译为媒介,意为两者之间。*СМИ (средства массов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是俄罗斯使用较为普遍的“大众传媒”术语,最早于20世纪70年代出现在俄语中,来源于法语 *moyens d'information de masse*, 而法语中有关术语则出现在60年代^①。此外, *массмедиа*、*журналистика*、*печать* 等在特定的条件与语境下也有传媒的含义。1990年8月生效的《苏联报刊与其他大众传媒法》第二条对于“大众传媒”的解释为,“报纸、杂志、

有线和无线电广播、电视节目、新闻纪录片以及其他各种公开传播大众信息的定期出版物”。1991年12月生效的《俄罗斯联邦大众传媒法》中规定,大众传媒是指“用于大众传播的印刷、音像材料及其他消息;定期印刷出版物、视听、电影档案资料及其他形式的定期传播的大众新闻”。俄罗斯联邦其他法律文件对“大众传媒”的规定是指期刊、网络出版、电视、广播、电视节目、广播节目、视频节目、纪录片节目、以固定名称定期出版的出版物等。本文使用的“苏联传媒”指在苏联社会信息传播过程中,与携带和传递信息有关的各种工具,包括报纸、杂志、广播、电视、通信、电影、图书等。1918年苏联制定了第一部苏维埃宪法,其中指出:“为了保障劳动人民发表自己意见的真正自由,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消灭出版事业对资本的依赖,把出版报纸、小册子、书籍和一切其他出版物的全部物质技术资料交到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的手中,并保证它们自由传播到全国各地。”^②

① Средства массов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https://ru.wikipedia.org/wiki/%D0%A1%D1%80%D0%B5%D0%B4%D1%81%D1%82%D0%B0_%D0%BC%D0%B0%D1%81%D1%81%D0%BE%D0%B2%D0%BE%D0%B9_%D0%B8%D0%BD%D1%84%D0%BE%D1%80%D0%BC%D0%B0%D1%86%D0%B8%D0%B8

② 赵中颢:《列宁新闻思想简论》,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

【作者简介】李淑华,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俄罗斯学刊》编辑部主任编辑。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苏联传媒体制研究》(项目编号:15BXW007)阶段性成果。

二、关于苏联传媒研究的历史分期

从笔者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来看,无论是俄罗斯学者还是中国学者对于“苏联传媒”都没有一个确定的历史分期。

俄罗斯学者 Б.И. 叶辛与 И.В. 库兹涅佐夫合著的《祖国报刊 300 年(1702—2002)》以及 Р.П. 奥夫谢皮扬的《最新祖国报刊史》在谈及苏联时期的传媒时,都将其划分为六个时期:第一,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十年;第二,20 世纪 20 年代末到 30 年代;第三,伟大的卫国战争;第四,战后十年;第五,50 年代下半叶到 80 年代初;第六,80 年代下半叶到 90 年代初。

此外,个别俄罗斯学者对“苏联传媒”进行了阶段性研究,如谢尔盖耶夫娜所写的《1950—1960 年苏联大众传媒的发展》,就是对 20 世纪 50 年代末到 60 年代初苏联传媒的研究;有学者还专门对 1917—1939 年苏联报刊进行研究。

目前,对于“苏联传媒”的六段式划分方法已经为俄罗斯学者所认可,无论是“通史”还是“断代史”都将苏联历史上重要的事件作为研究“传媒”的背景。《祖国报刊 300 年》与《最新祖国报刊史》两本著作的不同点在于,前者除苏联时期的传媒外,还颇为翔实地介绍了 1917 年前 200 多年俄国历史上的传媒(主要是报刊);后者则在六段式划分之前加上了 1917 年 2 月至 10 月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时期俄国传媒,其中谈及了二月革命与俄国出版物的发展、政治斗争中的出版物以及七月事件后的出版物。

从笔者目前所掌握的资料看,中国学者对于“苏联传媒”分期尚未有明确或者既定的划分方法。他们在对相关问题进行研究时,多以苏联某位领导人或者某一重大的历史事件为区间进行论述。有几篇论文是以“列宁、斯大林、戈尔巴乔夫”三位苏联领导执政时期为其论述的分期,其他多是断续的论述或选择较有代表性的震惊世界史的大事为其论证的基础与背景。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 国外研究现状

苏联解体前,由于国家对传媒的控制,在很长

一段时间,苏联学者对于传媒的研究均趋于表面化,并未深入到传媒与国家、政党、社会、意识形态等方方面面的关系及其影响与作用层面,如《党和苏联的出版物》(1954)、《关于党与苏联印刷、广播与电视》(1972)、《苏联农民出版物》(1984)、《苏联的广播与电视》(1989)等,这些文章或者书籍从报刊、广电、图书等媒体的产生、发展、语言、风格等方面入手,对苏联传媒的表象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

真正对苏联传媒体制研究有价值的成果多出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之后,随着戈尔巴乔夫推行“公开性”政策,苏联学者对本国传媒体制的研究开始出现新的动向。进入 90 年代,尤其是 21 世纪以来,俄罗斯对于“苏联传媒体制”的研究,无论是深度与广度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主要代表作有 Ф.Ф. 别列日诺伊的《俄罗斯出版史》、奥夫谢皮扬的《最新祖国报刊史》(1999)、М.М. 科兹洛娃的《祖国大众传媒史》(2000)、Б.И. 叶辛与库兹涅佐夫合著的《祖国报刊 300 年(1702—2002)》(2002)、Б.И. 叶辛与 Я.Н. 扎苏尔斯基合著的《俄罗斯报刊资料统计》(2003)、普罗霍罗夫的《报刊与民主》(2004)、Е.С. 摩尔达瓦诺娃的《1950—1960 年大众传媒的发展》(2008)、格罗霍多夫的《独立媒体在俄罗斯政治文化形成中的作用》(2010)、塔季扬娜·帕尔霍缅科的《从留立克王朝至今的俄罗斯文化》(2010)、《苏联遗产。俄罗斯政治百科全书》(2010)、扎苏尔斯基的《俄罗斯大众传媒》、А.В. 布柳姆与 В.Г. 瓦洛夫尼科夫合著的《苏联书刊检查(1917—1991)》(2004)、А.В. 布柳姆的《俄罗斯作家谈书刊检查与书刊检查员。从拉季舍夫至今:1790—1990》(2011)、Г.В. 日尔科夫的《苏联书刊检查史》、Т.М. 戈里亚耶娃的《1917—1991 年苏联政治检查》、П. 赖夫曼的《基于历史视角的俄国、苏联和后苏联时期书刊检查》等。

在俄罗斯(苏联)学者的研究中有全局与整体性论述,如 1996 年由莫斯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最新祖国报刊史》,这本书被定义为教学参考书,论及的内容有“极权统治下”的苏联大众传媒、民主改革时期的传媒变化。该书出版的目的在于阐释大众传媒在一党制、多民族、联盟体制下的苏联社会政治与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该书具有全面系统的特

点,完全不同于之前一些对苏联传媒个案的研究,比如十月革命与苏联传媒、传媒与专制体制、传媒与意识形态、传媒与80—90年代苏联重大事件等作品。资料丰富翔实,从《列宁全集》(俄文版),到1917年至20世纪90年代苏联各类报刊刊登的与大众传媒有关的一些文章都被集录其中,包括《真理报》、《论据与事实》、《莫斯科新闻》、《文学报》、《消息报》等。2002年由莫斯科大学出版社推出的《祖国报刊300年(1702—2002)》是俄罗斯第一本详细论述俄罗斯300年传媒历史的著作,时间从18世纪初报刊诞生一直延续到2002年,《祖国报刊300年(1702—2002)》将足够多的注意力用于对“1917—1991年苏联传媒”的论述上,虽然之前的历史有200多年,但所占篇幅不及70多年的苏联时期厚重。该书在关注共产主义旗帜下苏联传媒的同时,也用一定笔墨书写了那些被当局漠视的传播20世纪的自由主义、资产阶级、非布尔什维克政党、社会民主主义等传媒在苏联国内外的的发展状况。该书面向的读者主要是俄罗斯高校新闻专业学生以及所有对此感兴趣的人和新闻工作者。

俄罗斯学者对“苏联传媒”的研究是多方面的,第一,俄罗斯学者认为,苏联传媒的发展与意识形态以及书刊检查制度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有关学者在全面展示苏联书刊检查的表象与机理的同时,还深刻地挖掘了作为大众传媒重要组成部分的书刊检查制度对苏联社会、政治、经济等的影响。第二,苏联传媒继承了布尔什维克传媒的基本原则、功能与传统。依照列宁有关传媒的理论,即报纸是革命的宣传者、鼓动者和组织者,传媒是苏联政府的喉舌,是苏联宣传意识形态的工具。第三,苏联学者受意识形态的局限,对“苏联传媒体制”的研究只停留在表面,未能从根本上去挖掘“苏联传媒体制”本质。第四,传媒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扮演了助推器的作用。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中央开始推行“公开性”、“民主化”政策,使得苏联大众传媒的报道不断冲击苏联民众的“三观”,有时甚至出现“无底线”报道。苏联大众传媒报道的开禁,使苏联民众有机会了解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某种程度上扮演了旧体制“掘墓者”的角色。第五,独立之初,受苏联解体的影响,俄罗斯学者在研究“苏联传媒体制”时出现了

“一边倒”现象,即大肆宣扬“传媒”的负面作用,鲜有全方位评价。

西方学者对苏联传媒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他们还在苏联存续时期就发表了一批具有理论价值与学术价值,视角广、水平高的专著或论文。其中包括: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格雷戈里·沃克的《苏联书籍出版政策》,由戴安娜·韦伯出版社出版的米勒·杰米的《苏联电影:斯大林统治下的政治活动和信仰》,由劳特利奇出版社出版的布莱恩·麦克奈尔的《公开化,重建和苏联媒体》,马克的《苏联的大众媒体》,埃琳娜·安德罗纳斯的《转型中的苏联媒体:结构和经济的替代品》,詹尼弗·E.特平的《重塑苏联自我:前苏联的媒体和社会变革》,尼古拉斯·加利琴科的《公开性——苏联电影的回应》,埃伦·米茨凯维奇的《分裂的信号:苏联的电视和政治》等。此外还有已经翻译为中文出版的由美国传播学奠基人威尔伯·L.施拉姆撰写的《传媒的苏联共产主义理论》(载《传媒的四种理论》一书第四章);美国学者克里斯汀·罗思一艾撰写的《莫斯科的黄金时代:苏联建立的传媒帝国如何在文化冷战中落败》等。

西方学者对“苏联传媒体制”的研究可大概归纳如下:第一,苏联大众传媒被当作一种工具,即党和国家的工具。它们与其他国家权力工具和党的力量紧紧结合在一起,是维护国家统一和党的统一的工具,是国家发布指示、党开展“揭露”的工具,是专用于宣传和鼓动的工具^①。苏联大众传媒的工具属性不仅在列宁时期存在,而且一直贯穿苏联约70年的历史,即使戈尔巴乔夫时期倡导“民主化”与“公开性”,起初传媒依然被当作戈氏宣传改革的工具。第二,以全新的文化视角深刻剖析苏联在文化冷战中失败的原因。二战后,苏联全力发展现代媒体业,其传媒文化异彩纷呈。从中得出结论,苏联传媒长期以来一直在“前无古人的环境”中生长,一方面它努力向苏联人民灌输新时代的思想,另一方面它又不得不采取各种措施去适应当时的国内外环境,当一些矛盾无法调和时,苏联传媒亦随着联盟国家的瓦解而最终走向坍塌。第三,以书刊检查等具体问题为切入点的研究着重剖析其产生的

^① [美]弗雷德里克·S.西伯特、西奥多·彼得森、威尔伯·施拉姆:《传媒的四种理论》,戴鑫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8页。

政治和时代根源，即苏共的一党制。从方法论的视角另辟蹊径，以便更准确、更深入地把握和认识苏联书刊检查制度对本国学者思想自由禁锢，对苏联文学的伤害^①。第四，戈尔巴乔夫利用传媒确保广大人民群众对其改革给予支持。第五，传媒的忠诚与顺从，减缓了苏联国家和社会的民主化进程。第六，苏联大众传媒是政府全面控制人民思想的一种有效手段。第七，“苏联传媒理论”也被称为“共产主义媒体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思想相结合的产物。

（二）国内研究现状

中国对于“苏联传媒体制”的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苏联解体前与解体后。

1. 苏联解体前

苏联解体前，我国有关“苏联传媒”的研究成果不多，且多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尤以1985年之后居多，这一点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公开性”政策有直接的关系。1985年后，中国学者深层次接触苏联媒体的机会越来越多，其笔触主要涉及的领域包括苏联的新闻报道、新闻学研究、新闻改革、新闻法、新闻事业以及斯大林的新闻模式等。1991年12月之前中国关于“苏联传媒”研究的专著有赵永福等人合著的《列宁的新闻思想和新闻实践》（1986）、赵永福与傅显明的《列宁与新闻事业》等。较为简短的新闻报道或者概况简介，主要涉及的领域多为“新闻”，没有触及出版、电视、广播等，所占版面最多的也不过4页，还不能算作研究。此间，具有代表性的作品除上述所列赵永福的专著外，还有韦政强的《苏联新闻报道的新变化》（1986）、刘水才的《列宁新闻学研究的丰硕成果》（1987）、丁永宁的《苏联新闻媒介的变化》（1987）、高凤仪的《引人瞩目的苏联新闻改革》（1988）、方黎的《苏联新闻事业欣欣向荣》（1989）、童兵的《苏联新闻出版法生效》（1990）和徐耀魁的《讨论中的苏联新闻法》（1990）、康荫的《评所谓的斯大林新闻模式》（1991）等。苏联解体前，中国学者对于“苏联传媒”研究的主要内容为：第一，关注列宁的新闻事业，指出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关于报刊的思想同样贯穿于十月革命后的报刊实践，十月革命后列宁的相关思想伴随着苏联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而不断更新；指出我国新闻界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着力于研究

列宁在十月革命前的办报经验和理论，而对十月革命后的内容很少问津^②。第二，对中国国内有关“列宁新闻事业”的专著进行评论，指出有关书籍的作者实事求是地以翔实的资料为基础，对列宁的新闻事业进行研究，展示了列宁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将新闻理论与新闻实践进行了有机结合，并指出列宁新闻学是对马克思新闻学的继承和发展。第三，报道《苏联新闻出版法》的产生过程，简要叙述《苏联新闻出版法》各章的主要内容。第四，关注苏联新闻报道的变化，落脚点多为新闻的长度、内容、时效性等，指出苏联新闻报道的真实性、战斗性、可读性较之前明显增强以及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对苏联新闻事业的关注。第五，结合我国的新闻实际，对一些人在“斯大林新闻模式”中的“新闻管理人治而非法制”等方面的讨论进行反驳，并称这种探讨“实不可取，只会陷入歧途”，等等。

2. 苏联解体后

苏联解体后，我国关于“苏联传媒”的研究成果开始丰富起来，20世纪90年代尚不多见，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苏联的解密档案逐渐增多，国内学者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郭传靖的《戈尔巴乔夫的新闻思想及其带来的恶果和教训》（1994）；贾乐蓉的《列宁新闻思想及其评析》（1998）；郑超然、程曼丽等在《外国新闻传播史》（1999）一书第十章第二节论述了《苏联时期的新闻传播事业》；赵中颀的《列宁新闻思想简论》（2002）、严功军的《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俄罗斯传媒政策的变迁及反思》（2003）以及其在博士论文《变迁与反思：转型期俄罗斯大众传媒研究》（2004）中单独辟章对苏联传媒，尤其是戈尔巴乔夫新闻思维与新闻体制进行研究；黄文龙的《苏联与俄罗斯新闻体制的历史变迁与反思》（2005）里谈到了列宁、斯大林以及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新闻体制；侯丽军的《对苏联“公开性”改革中大众传媒的重新审视》（2007）；肖立的《基于社会冲突理论的前苏联戈尔巴乔夫新闻制度改革分析》（2010）；潘祥辉的《论苏联解体中的传播失灵因素——兼驳苏联解体的“舆论失控说”》（2011）；

^① 李淑华：《苏联书刊检查制度研究综述》，载《俄罗斯学刊》2014年第4期。

^② 刘水才：《列宁新闻学研究的丰硕成果》，载《现代传播》1987年第8期。

尹中南的《苏联新闻体制形成与演变研究》(2011); 贾乐蓉的《苏联新闻法立法背景考察》(2012); 陈力丹的《列宁论苏维埃新闻传播事业》(2014); 张举玺的《论〈苏联报刊与其他大众传媒法〉特色》(2014); 王薇、许昊的《浅析列宁新闻思想的现实意义》(2014); 姜昕的《斯大林新闻思想评析》(2014); 张举玺的《苏联晚期媒介生态与体制》(2016); 等等。除此之外,我国学者还对与“传媒体制”息息相关的“书刊检查制度”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如马龙闪的《苏联的书报检查制度及其对党和国家发展的影响》,李玮的《转型时期的俄罗斯传媒》第七章“转型前后的新闻查禁”,李赛可、陈卓的《苏联书报检查制度与苏联解体》,李淑华的《列宁时期书刊检查措施及其评价》、《勃列日涅夫时期书刊检查制度探究》、《戈尔巴乔夫时期书刊检查制度评析》等。

纵观苏联解体后国内有关“苏联传媒”的研究可以发现,我国学者对相关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第一,列宁的新闻思想。我国国内有关“列宁新闻思想”的研究由来已久且比较深入。有的学者对“列宁的新闻思想”进行简要但全面的总结,有的学者则著书立说,对列宁重要新闻论著进行深度剖析。从列宁诸多新闻思想来看,无论是报纸是集体的宣传员、鼓动员和集体的组织者,还是报纸是进行政治斗争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都能从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列宁的新闻思想与俄国革命以及苏联的社会政治经济建设的实践息息相关,是变化的、创新的、提升的、完善的。第二,斯大

林时期的新闻体制。有关学者在通过梳理斯大林传媒模式的形成与发展并最终走向僵化的同时,也深刻地揭示斯大林为了达到控制国家舆论、控制意识形态并掌控国家领导权等目的,采取各种手段将苏联大众传媒牢牢地握在自己的手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传媒为战胜德国法西斯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三,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新闻制度改革以及传媒与苏联解体。研究传媒在苏联解体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认为传媒在苏联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由于其僵化的模式,民众知情权受到限制,西方“自由言论”乘虚而入,占领舆论阵地,联合反对派媒体控制言论,使得大众传媒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第四,苏联报刊与大众传媒法产生的背景与过程,这部法律通过后,苏联高度控制的新闻体制不复存在,党对传媒的垄断逐渐消失,最终苏联共产党失去了国家的舆论阵地。第五,书刊检查制度贯穿苏联的始终,即使列宁曾宣布取消书刊检查制度,但这一制度在苏联一直存在,并最终成为苏联解体的助推器。第六,苏联是传媒大国,规模与影响力在世界传媒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的苏联历代领导人都十分重视“大众传媒”的发展,他们往往通过对传媒的控制“指导”民众的思想趋向。

可以说,国内外学者有关苏联传媒体制的研究范围广、内容庞杂。但尚缺少一份全面、深入、系统的关于“苏联传媒体制”的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 新会新)